

移民岁月

第二十二期

YI MIN SUI YUE

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建设者——秦伟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今年已经90岁的秦伟是最早参与筹建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无线电专业尚有神秘感，人才更是抢手，从西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秦伟从毕业那天起就被抢来抢去，命运的旅途从西南到西北一路顺风，后来留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时间不长，他又被支边的领导相中，点名带到了宁夏。

1958年6月，秦伟从北京踏上西行列车向宁夏出发。见证并全身心地参与了宁夏广播事业从无到有的艰难起步。那年他刚刚28岁。

秦伟：我是1930年出生，西安人，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1951年3月在四川参加工作，那时懂无线电的人很少。工作后是南下北上，四处奔波，参加过四川、内蒙古、河南、重庆等地广播电台的建设。

在重庆搞无线电工程安装时，当地主管工程师知道我懂无线电，又肯钻研，就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重庆。重庆是大城市，文化积淀很深，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后来这位老工程师真的把我调到了重庆，从那开始，积累了很多电台发射机设备安装经验。

那时候没有电视，广播还处在普及和发展阶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缺专门的技术人员，派人到全国“抢人”，1953年我又被调到了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

进了首都特别高兴，工作上轻车熟路，得心应手，热情更高了，从来不知道累。忙里偷闲，还在北京处了个对象，经常约着到景山公园一起读书，那时候真的

感觉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阳光。

1958年5月我到天津出差，在出差地接到北京的电话，让我马上回京，回去后还没休息，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调我到银川，参加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

说真的，听到这个调令后懵了，一是对宁夏一无所知，二是在北京刚刚有了对象，舍不得离开北京。

我准备给领导讲讲自己的情况，希望能留在北京。找我谈话的领导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筹建，还要建一个广播电台，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他还告诉我，是刘亚民点名要的我，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没有回旋余地了。

刘亚民是筹建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负责人，那时候我与刘亚民也不是很熟悉，只是刚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在刘亚民的领导下做过一个工程。那时候工作热情很高，每天爬高跑下的也利索，干事没怨言，还经常能用些小技巧解决工程上遇到的难题，也就引起了刘亚民的注意，点名把我要到宁夏。

当时倡导做革命的螺丝钉，接到调令后就开始做去宁夏的准备。没想到的是，手头的事情还没交接完，宁夏的工作就压到身上，而且关系重大。

上世纪50年代，有这样一句话很鼓舞年轻人：“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准备离开北京的秦伟没有过多考虑对象的问题，更多的精力是在考虑怎样做好这块革命的砖。没想到的是，在办交

接手续过程中，正在筹建中的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砖，搬到了重要位置。具体工作是去选择关键的技术设备——发射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同事们说：“秦伟还没拿宁夏台的工资，就开始干起了宁夏台的活。”

秦伟：在我办理调动手续时，中央台调拨了一台二手发射机给宁夏，让我去把北京一个老电台的发射机拆下来带走，我参与并负责过那个老电台的建设。当时北京有一个发射机组，是由西直门、紫竹院和王府井白纸坊的3台发射机组成，信号覆盖了北京市。解放后北京市地域面积扩大了，信号强度不够，换了更大功率的发射机，原来3台小功率发射机就调拨给了地方台。给我的任务就是在3台发射机中选出1台拆下带走。

那3台发射机有1台是缴获国民党的、另两台分别是北京广播器材厂和天津广播器材厂的，我对3台设备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比较熟悉。

让我代表宁夏台去选设备，那我就要选最好的。我指名要在白纸坊的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发射机，原来老电台的人以为我不懂，开始还鼓动我选新一点的天津广播器材厂的产品。可我知道3台设备中北京的那台质量最好，就坚持要那台质量最好的。北京老电台的人一听就不干了。双方谈不下来，报到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技术处，让上级仲裁解决。

中央台技术处的领导开始也想让我选最新的那台设备，但我坚持不论新旧，

只盯着质量最好的。我跟技术处的领导争论说：宁夏地处西部，各方面条件都比不上北京，遇到问题解决难度大，应该选择一台技术性能相对稳定的设备。中央台的领导也很有大局观，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一些老同事很不高兴，说我还没拿宁夏的钱就开始偏宁夏的心。

在深知关键技术设备性能优劣的情况下，秦伟靠技术积淀和坚持为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在装备上争得了第一个先手，但要让先手变成结果，他还需要继续在没拿到宁夏工资的情况下，再干点宁夏的活，把设备全部拆解下来，完完整整地带到宁夏。

秦伟：整个拆解过程十分麻烦，一个小螺丝和小垫片都不能少，有的东西还娇贵，怕伤着，大箱子套小箱子的仔细包装起来，特别费事。

最大的部分是发射机架，大概有八米长，厚度和宽度也有两三尺，这是个关键的设备，整个拆除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一来争设备时得罪了人，二来我也不敢让别人插手，怕弄掉个小零件什么的，还要做详细的记录，用了一个多月。

火车站托运时又遇到了难题，一说要托运到宁夏，管托运的人说，宁夏早就撤销了，无法托运。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领导，请他们想办法，自己先坐火车离开北京，到了宁夏。火车先到西安、再转车到兰州，当时银川还没通火车，只能先到中卫再乘汽车到银川。（**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宁夏京剧团当家武生——高韵笙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高韵笙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保留的一些纪念章，有波兰的金十字勋章；罗马尼亚银质勋章；捷克斯洛伐克反坦克英雄勋章；1957年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节获得的《水帘洞》金质奖章；还有他参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全国政协会议的纪念章。

高韵笙：《水帘洞》这出戏是中国传统的京剧看家剧目，里边的猴戏分量很重，也是京剧四团每次出国访问带的经典剧目，外国人对里边的猴戏特别叫好。

当时所到的一些非洲国家与咱们还没有建交，按总理的话讲，我们这是戏曲外交。记得去埃及演出时，中国与埃及还没有建交，我们演出结束后不长时间，埃及总统就下令，限台湾驻埃及代表3天内离开。

我们还参加过在埃及的升国旗仪式，当时的外交部领导说：“与埃及建交过程中，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听后都很激动，也特别的自豪。”

那几年出访任务真不少，很多外国人压根没看过京剧，但他们对中国的京剧艺术还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好奇。特别是猴戏，用猴拟人的表演，内涵很深。他们特别喜欢看京剧里的猴戏和武打戏。也因为我在戏中出演美猴王，一些国外报纸还给我送了个“国际猴”的美誉。

我们到国外出访演出时都是国家民委副主任马玉槐带队，1955年，马玉槐带着我们上巴基斯坦访问演出，我们所有演

出的道具、服装、化妆用的箱子都是自己搬，自己抬。

我们每到一地方，所有演出需要做的活都是自己干。大角也跑龙套，也打扫卫生，非常平等，全团上下工作氛围特别好。在巴基斯坦是露天演出，舞台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搭台子、拉布景、搬道具、布灯光、装车、卸车全是我们自己干，所以马玉槐对我们团的作风特别喜欢，很是信任，也是因为信任，他把我们从北京要到了宁夏。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马玉槐从国家民委调到了宁夏当副主席。据马玉槐后来讲，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周总理找他谈话，问有什么困难和需要，他对周总理说：“希望把中国剧院四团带到宁夏，有外事活动也能露脸。”周总理满足了马玉槐这个要求，就这样，中国京剧院四团从北京来到宁夏，组建了宁夏京剧团，高韵笙说：全团都来了，来的时候热情很高，一心一意想着为建设边疆出力。

高韵笙：在来宁夏前，对这里没有了一点了解，团里先是召开了会议，宣布这个消息，同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宁夏的情况。老实讲，我们绝大多数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还有宁夏这个地方，动员时说是支援边疆，把边疆建设好了还可以回来。团里还让大家举手表决。

这个团的老底子都是从部队下来的，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部队的老传统，大家都

表示，要一切听从党安排，全部举手同意，没有一个不举手的，两分钟就决定了100多人和家属一生的命运。

动员会后，全团上下都行动起来，装箱打包，说真的，当时热情还挺高，加上家属，从办公用品，到生活用具，演出行头、道具、所有的家当装了满满一列车。我们团里很多家属在北京都有工作，也申请调到宁夏，在家属的安排上宁夏做的特别好，所有家属全部安排到对口单位。我老伴在北京时是新华印刷厂的职工，调到宁夏后直接安排到了宁夏印刷厂。

尽管来时热情很高，但火车一路西行一路荒凉，大伙心里的热度也有了变化，真的到了宁夏，很多人就傻眼了，刚通车的银川站还没有站台，边上有两个帐篷，一个写着货运，一个写着客运，有好多家属一看这情境就哭了。也难怪，从北京来到这，大家要有个适应期。

后来给我们安排到文化街一个空空的大院里，我们自己打土坯，盖房子，很艰苦，我是从部队里锻炼过的，对吃苦有着充分的准备。

来宁夏时带着一儿一女，新房子盖起来后，每家分到了两间，住进了自己盖的房子里还真真是高兴。开始连电灯都没有，用煤油灯。

我们是一边盖房子一边排练，没有排练厅，就把院子里的土地平一平当起了排

练场，很快就恢复了演出，第一场演出是在东方红剧场，也是宁夏京剧团给宁夏人民的第一次演出。

演的是《闹龙宫》剧场满满当当的。演员一看观众满场的架势，热情更高了，有种献礼的味道。那时候演得最多的是《水帘洞》《四郎探母》《霸王别姬》《闹龙宫》这些戏，当时有个新闻纪录片，就是拍的宁夏京剧团演的《闹龙宫》里边的一段戏，拍过我在镜头里打旋子。

说起打旋子还有段故事，我在北京时有一个师兄，叫韩运杰，他能连着翻70个斤斗，我说我能打70个旋子，因为打旋子比翻斤斗强度还大，开始他不信，我俩就打赌，谁输了请对方吃涮羊肉，最后他在老北京饭店请我吃涮羊肉。

听高韵笙先生讲述的3个小时中，已经91岁高龄的老人腰板始终挺直，嗓音敞亮，透出一生从艺的功底和厚礼待人的品德。说到遗憾处高韵笙老人讲，刚到宁夏时团里的好角很多，宁夏对这些大角宣传很少，再加上京剧拼不过秦腔，很多大角都可惜了。

上世纪60年代早期，高韵笙在一次练功中腿部受伤脱离了舞台，相继在宁夏戏曲训练班、宁夏京剧团、宁夏艺术学校任教，曾任宁夏京剧团艺委会主任、顾问，1985年离休。

（**薛正昌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在宁夏创业的难忘岁月

胡传斌

我是一个新闻老兵，尽管我已于1998年11月离开银川来上海定居，但我对在宁夏创业的艰苦岁月却永远难忘。

1958年9月，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筹建组的李素本和葡法先等3名同志来到上海动员新闻工作者支援宁夏建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召开了动员大会。在会上，李素本介绍了宁夏的情况，然后，她伸出两个指头说：“实话告诉同志们，严格地说宁夏广播电台现在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大量的建台工作等待大家去筹划。宁夏人民需要你们，宁夏的建设需要你们，欢迎你们到宁夏去！”听说宁夏要成立广播电台，又急需建设人才，许多同志热血沸腾，纷纷报名，要求到边疆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我和怀孕的妻子也不甘落后，抢着报了名。不久，礼堂里贴出一张红榜公布了95名支宁人员名单。记得当时大家互相转告，互相祝贺，和留在上海的同志倾吐离别之情。这95名同志，从编、采、播、录音、增音、发射，到行政管理，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广播电台工作队伍，由后来担任副台长的陈晓光同志带队，于1958年9月从上海出发了。当时，我妻子生下孩子刚刚10天，就没有随队伍一起出发，但为了纪念我们这具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我们夫妇特地给孩子取名建宁。我无法按捺住急切奔赴银川工作的心情，在孩子尚未满月的时候，离开她们母子，和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一批支宁同志一起登上西去的火车。当列车途经兰州，进入宁夏境内，穿越腾格里大沙漠

时，沿途一片荒凉景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河，看到大沙漠。窗外荒无人烟，但我心里却充满了兴奋、新奇的感觉。9月25日，我们到达银川。当时，包兰铁路刚通车一个多月，银川火车站还没有建好，下火车时，我们是从车厢里纵身跳下来的。有位离别丈夫、怀抱幼儿的女同志跳下火车后，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坐在土坯上哭了起来。一位幽默的记者劝她说：“别哭，别哭，面包会有，牛奶会有的，漂亮的火车站也会有，你的丈夫也会来的！”女同志破涕为笑了。

到银川的第二天，我就到编辑部报到。当时的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在银川市文化街，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编辑部领导小组由上海电台来的吴文声、安徽电台来的沙荻、原宁夏省电台的李生祯3名同志组成。电台的重点节目是《全区广播站联播节目》，全台编采人员只有29人，记者大都下乡下乡采访去了，编辑们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在10月25日成立，电台特地开办了《天下黄河富宁夏》节目，由我编发。当时，电台还利用“广播大会”的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直接传达给全区人民。那时候，大家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工作效率也很高，记者、编辑们经常在晚上加班写稿、制作节目，甚至通宵达旦地干。

1960年到1962年连续3年自然灾害，全区人民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日子。各个机关单位都兴办农场。电台在银川市郊三支沟发射台所在地办起农场。全台

同志轮流去劳动，自己动手生产粮食和蔬菜，养猪、养鱼。叶诚长派他的妻子杨小琳和记者吴恺下食堂抓伙食。食堂炊事员用粗粮和白糖制作“康复饼”，供应给因营养不良患糖尿病的同志。有时，记者和编辑加班写稿到深夜时，就用韭菜和面粉煮一锅“调和”（实际上是面糊糊），热乎乎地喝上几大碗，大家觉得胜过美味佳肴，吃得津津有味。记得在宁夏电台台建5周年的喜庆日子，大家用自己农场生产的鸡鸭鱼肉蛋和蔬菜举办了一次庆祝宴。全台同志欢聚一堂，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欢庆宁夏电台经过创业的年月，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大家那种欣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建台初期，尽管工作繁重，学习紧张，生活艰苦，然而全台同志思想稳定，情绪饱满，纪律是十分严明的。电台领导十分注重抓思想政治工作，对下乡采访的记者，提出了要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的要求，还规定记者无论是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还是在社员家吃饭都要付粮票交饭钱，决不许多吃多占，也不准在下面采购紧销商品。当时的记者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里度过的，都经历过艰苦的采访生活，具有踏实的采访作风。一些从北京、上海等地来的同志，到西海固山区及盐池、中卫等地采访，仿佛从大都市来到了穷乡僻壤，生活不习惯，只能努力去适应。有位记者刚下乡时怕染上虱子，晚上睡觉把衣服脱光，用绳子扎好，吊在房梁上。这件事成为

编辑部里的笑料。后来这位记者习惯了乡村的生活，再也不怕虱子了。那时交通很不方便，采访主要靠两条腿。语言不通，靠乡村干部当“翻译”。记得1959年10月20日，编辑部让我打电话给一位驻县记者，让他到盐池县一个公社采写一篇庆祝自治区成立一周年的通讯，必须在10月23日以前发稿，时间很紧迫。他接到电话的当天就雇了一头毛驴骑上向公社赶去。出了县城，沿途是茫茫的沙漠，不巧，又刮起了狂风，黄沙蔽日。他的眼睛被刮得睁不开，驴背把他的臀部都磨破了。30多公里的路，到晚上7点还看不到目的地，毛驴累得在沙窝里直打转转，不肯前行，用柳枝打了几下，它索性趴下不走了。记者急得不行，就掏出包里仅有的几个馍馍喂毛驴吃，过了好一会儿，毛驴才慢慢往前走。晚上8点多，记者总算来到公社，他顾不上吃饭，抓紧时间向社干部采访。深夜就在煤油灯下赶写稿子。第二天又赶紧返回县城，打电话把稿子传到编辑部，保证了及时播出。记者们这种不畏艰苦的工作作风和勤恳的劳动态度，使我们坐在办公室的编辑们很受感动。

（作者简介：中共党员，祖籍安徽省泾县，1926年6月生于上海，1949年5月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肄业，1949年8月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到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58年9月支援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历任群工组长、新闻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摘自《西部拓荒》）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 光辉战斗历程

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1942年6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2月改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任命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为司令员，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谭政（兼）、副主任傅钟、甘西淇。随后将晋西北军区改称为晋绥军区，贺龙仍为司令员。

把敌人挤出去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后，贺龙、关向应、徐向前、林枫等，首先遵照毛主席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在晋绥分局的统一领导下，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党政军民齐动员，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形式全面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这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经过4个月的努力奋斗，晋西北军民在827个自然村摧毁了“维持会”，在535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多数分区把敌人“挤”回到了交通线附近。到1943年底，共“挤”掉敌人据点54个，恢复了1000多个村庄，粉碎了敌人大小13次“扫荡”。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蒋介石乘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一面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党必须交出边区政权”，一面密令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在我不肯就范时以九路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此情此景，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早有察觉，遂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在政治上向国内外充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罪行外，在军事上亦作好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充分准备。

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对前方抗战和后方防御都作了重新部署，形成黄河两岸摆战场的态势。除令其第三五九旅仍坚守陇东（合水、庆阳、曲子、孟坝）地区，警备第一旅仍坚守关中马栏襄形地带，警备第三旅仍坚守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外；将第三五九旅配置在南线的临真、甘泉、富县地区，独立第一旅配置在北线的佳县、米脂、绥德、吴堡地区，进行防御；同时命令第三五八旅和骑兵旅集结于富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之葫芦河地区，以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由于我党我军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停止了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贸然进攻，其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西北地区宣告破产。

普遍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及其他

纵上所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普遍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南泥湾屯垦”，以及苏懿率领的四支队定边打盐，都为边区军民树立了光辉榜样。通过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民族、阶级觉悟及战斗力。

抗战胜利后，贺晋年率领的警备第三旅配合三边地委于1945年10月，成功地策划驻安边国民党新编十一旅的光荣起义，使其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6年秋天，其新四旅、教导旅在代司令员王世泰和代政治委员习仲勋、副政治委员张仲良的率领下，成功地策划驻横山波罗由胡景铎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保安团光荣起义。随后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八师。

1947年冬天，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地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与“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志气）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此次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性，发扬民主作风，激发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据宁夏党史教育网）

张宜之歪改《陋室铭》

鸦片战争以后，禁烟之举屡兴，禁烟之人辈出，无奈当时政治昏暗，吏治腐败，你禁他弛，有始无终。民国四年（1915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在全省禁种鸦片，其时宁夏尚未建省，是甘肃省的一个府，自在禁种之列。但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任督军陆洪涛借口为军队筹饷，重新开放，种鸦片可按亩征税，名曰“寓禁于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宁夏省中宁县有个渠口堡，约百户小镇，有烟灶134盏，平均每户1.3盏。有的户父子各有烟灯，并榻而睡，吞云吐雾。同年，宁夏省政府成立禁烟委员会，省主席马鸿逵自兼主任委员，各县成立禁烟分会，以各县县长为委员，规格很高，机构庞大，看样子要大禁了。其实不然，只不过将民间烟土收缴上来，转弯抹角进了马鸿逵的私人账房，倒手出卖，由黑变黄（金）。真是禁而不禁官，禁贫不禁富，禁种不禁抽，禁卖不禁买，其实是只准马鸿逵自己卖，达官富户，我行我素，照抽不误。

那时，中宁县丹塔乡，有个落魄书生，名叫张宜之，虽非饱学之士，却在富有之家。其人为人，嗜好有二，一是嗜烟，瘾大超人；二是嗜文，爱文成癖。虽然没有大作传世，但也有些小诗短联，流传乡间。一天，他过足烟瘾，顺手拿起一本《刘宾客文集》欣赏，忽然翻到《陋室铭》，连看数遍，触文生情，于是提笔改曰：“灯不在高，有油则明（那时民间使用的是麻油灯）；枪不在长，有烟则灵。斯是宁土，惟味芳馨。垢痕上襟鼻，烟色入脸膏。谈笑有瘦鬼，往来无壮丁。可以舒筋骨，过大瘾。无政务之乱耳，无桑麻之劳形。云南龙志舟（云南省主席龙云志舟），宁夏马少云（马鸿逵字少云），百姓云：何陋之有！”张宜之改罢，诗稿朗诵，颇为自得。趁着兴浓，工笔抄录，贴于炕头。真是自甘暴弃，虽是个人之悲剧，也是时代之写真。后来传到外面，见者无不捧腹。（据宁夏文史研究馆网）